

# 论苏轼“以诗为词”艺术表现与文化根源探析

祝丹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5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5日

## 摘要

苏轼是我国宋朝文坛上杰出的代表，他在诗、词、文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作为“词中之龙”，其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以诗为词”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打破了传统词体的藩篱，在词坛掀起了一场革新风暴。本文旨在剖析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表现，从题材拓展、手法借鉴、风格变革等角度展开，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如宋代的文化政策、士人的精神风貌等，同时分析这一创新对后世词学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全面展现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 关键词

苏轼，以诗为词，创新，文化根源

#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Roots of Su Shi's "Writing Ci in the Style of Shi Poetry"

Dan Z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5,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published: June 5, 2026

## Abstract

Su Shi stands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literary figure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China, achieving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in poetry, ci, and prose. Hailed as "the dragon of ci poetry", he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ci. His creativ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writing ci in the style of shi poetry" broke the barriers of the traditional ci form and sparked an innovative revolution in the ci circle.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Su Shi's "writing ci in the style of shi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matic expansion, technique borrowing, and stylistic

transformation. It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cultural roots, such as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scholar-officials, and examine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is innovation o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ci studies, so as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vital significance of Su Shi's "writing ci in the style of shi poetry" in the history of ci studies.

## Keywords

### Su Shi, Writing Ci in the Style of Shi Poetry, Innovation, Cultural Roo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一生极其坎坷,经历了“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他对宋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时代精神、词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个性化创作对词进行创新。他提倡“以诗为词”,写下了大量的豪放词,并从整体上改造了传统的文人词,大大拓展了词境,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以及音乐对词的束缚。其主张“词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凡怀古、记游、说理、抒情等皆可入词。因此,对苏轼的词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想了解苏轼的“以诗为词”并且把握其词的内涵与创新我们必须分析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苏轼其人其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苏轼词的整理与校注。如《东坡词编年笺证》[1]收苏轼词360余首,并对317首做了编年考订。《全宋词·苏轼词》[2]中收录了苏轼词多达360首,并且还包含了苏轼词的词调、题序、注文、按语等。《苏轼词编年校注》[3]从不同版本下手确定苏词的真伪,把53首“苏词”和九则残句列入了误入词。《苏轼全集校注》[4]博采传世苏词各类重要刊本,系统完成苏词的校订释读、年代考订、评语汇编与疑难辨析等文献整理工作。《东坡乐府笺》[5]也是研究苏词不可或缺文本。

其二,苏轼生平的研究。《苏轼评传》[6]从苏轼的生平经历、哲学思想、政治态度、美学思想以及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7]全书共四卷,第1卷写苏东坡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第2卷主要写他的壮年时期,第3卷主要写他人生中的成熟阶段,第4卷写他被迫害后的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涯。本书对苏东坡的超人才能及其政治生活、文学生活等都作了生动的描述和评价。王水照的《苏轼传》[8]将苏轼一生的经历与他一生所有璀璨的作品互为编织,那感人肺腑的诗词背后是苏轼一生中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再者,诗词承载着苏轼宦海沉浮的境遇与内心的真实情志。作者将其文学创作与人生轨迹互参互证,令读者于吟咏诗词中窥见其生平,于人生阅历中领悟其诗文要义,为我们了解苏轼其人、其词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范式,打开了研究苏轼词的新大门。

其三,苏轼的词及词学理论的研究。《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9]一书以诗作对比来考察苏轼词的特点,充分挖掘了苏轼词的思想全貌,深入研究苏轼词里所表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我们对苏轼词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刘少雄的《苏轼词八讲》[10]深刻阐发和揭示了苏轼词的主要特征以及苏轼词与人生的幽微关系,为当下读者了解冠绝千古的苏词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本。《苏轼词新论》[11]一文围绕苏词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再作探讨,并对传统词学理论与词学观进行了重新思考。《中秋词——东坡超然人生的放歌》[12]从中秋词入手对苏轼的词进行分析。王水照《苏轼研究》[13]指出,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限,融入诗性意境。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14]强调苏轼词中的哲思对词

境深度的影响。艾朗诺(Ronald Egan)《苏轼的一生：言论、思想和行为》探讨其词中的士大夫心态。除此之外，还有单篇论文从苏轼的 Huangzhou 词、节序词、隐括词、咏物词、苏轼词的儒释道内涵、女性形象、用典、意象、词学观、以诗为词以及后世对苏轼词的接受等方面对东坡词进行探讨分析，具体可参看赵英超《新时期以来苏轼诗词研究之再研究》[15]、谢娟燕《近 40 年苏轼婉约词研究述评》[16]不一一赘述。

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打破了词体桎梏，开辟了词学新境界。“以诗为词”并非简单地将诗的形式移植到词中，而是从题材内容、表现手法、风格意境等多个方面对词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使词从狭隘的歌筵酒席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极大地拓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内涵。故本文打算从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表现和文化根源来探讨苏轼词的发展与继承，以期从新的角度发掘苏轼词独有的艺术内涵，其不足之处，祈大家斧正。

## 2. “以诗为词”在苏轼词中的具体运用

### (一) 题材的拓展

在词体文学发展史上，苏轼实现了从“词为艳科”到“以诗为词”的文体革新。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坛承袭晚唐花间传统，题材多局限于闺阁情思、宴游享乐的婉约格局。苏轼则以士大夫的广阔胸襟重塑词体，将诗中的常见题材引入词中，使词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 (1) 家国情怀的诗性表达

北宋前，词多被用来描写花前月下，词境也趋于柔软，被视为“小道艳科”，这大大限制了词的创作，大多词的创作都是一味地堆砌辞藻，内容空洞，思想力度小，词的传唱程度也大大降低。苏轼致力于改变词的现状，使词能够表达作者自己的情感。如其《江城子·密州出猎》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17]的雄健笔力，将边塞诗中常见的家国情怀注入词中，此词以诗话语言重构“射天狼”的典故，“天狼”暗指西夏侵边之患，强烈表现出苏轼渴望报效朝廷、抗击外敌的雄心壮志。《点绛唇·醉漾轻舟》中的“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17]，这首词是苏轼于杭州各县视察民情时所作，这段经历让他看到了百姓的困苦，他讥讽时政但无可奈何，最终大失所望写下了这首警世词。这首词表面是写一个醉汉泛舟寻求自己心中的“桃花源”，醉汉任凭船把自己带到心中的那块理想地，实则是词人自己在寻求政治出路，寻求国家和人民的出路，但最后却失望而归，作者心中无路可走的悲凉跃然纸上。

#### (2) 民间生活的审美观照

苏轼将他的艺术视角投向民间，《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组词以“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17]的清新笔触，开创了宋词描写农村题材的先河。词中呈现的煮茧缫丝、古柳卖瓜等生活场景，不仅拓展了词的题材，更通过文人词与民间生活的对话，构建起雅俗交融的美学新范式。《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菡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17]这是苏轼赴石潭谢雨途中的所见所闻。上半阙主要写村姑，作者简单几笔，她们的形象便惟妙惟肖。“旋抹红妆”、“相挨踏破菡罗裙”，生动地写出了村姑们的好奇和娇羞。下阙泛写了村民，集中写了一老叟。通过“扶携”“卧”这两个体态语看出村民们的喜悦与朴实。苏轼突破了以往词中鲜少对底层人民生活关注的局限。

#### (3) 生命哲理的深度开掘

苏轼从名满京师到银铛入狱再到四处流放，他这多舛的一生，决定了他对人生以及情感有着异乎常人的体验。“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18]，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7]。任凭风吹雨打，他处之泰然，毫无忧虑，即使天晴也不见喜色。当他回首望向那片曾经萧瑟的雨树林时，他的内心并没有因为眼前的宁静而感到

欣喜,也没有因为过去的困苦而感到悲伤。“他已经超越了悲与乐、愁与欢的界限,心灵在‘淡然无忧乐’中摆脱了外物的束缚”[14]。又如“何人无事,宴坐春山”[17]。(《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十二月(1084),在泗州时,词人与家人贫病交加,幸得太守刘士彦的悉心帮助。为了陪苏东坡,刘士彦不惜知法犯法陪词人渡过长桥。后苏轼写下这首词记载了这段冒险过桥的经历,引起了刘士彦的恐惧,连忙劝说东坡“勿以示人”,东坡回答道:“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乌台诗案让苏轼因文字而下狱,苏轼犹如一头受惊的小鹿,整日心力交瘁。因此“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是说“是谁闲来无事,坐在空旷的山上呢?”,表达出了词人对闲适、归隐生活的向往,这也正是他颠沛流离后的理想生活。

## (二) 手法的借鉴

苏轼在词体革新中实践了“破体为文”的创作理念,“破体为文”即打破文体界限,将诗歌的叙事结构与议论文植入词体肌理,实现文体互渗。

### (1) 叙事结构的诗话移植

其《水调歌头·丙辰中秋》[17]将诗歌的叙事结构借鉴于词体中,它完整叙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开篇“把酒问青天”承袭《楚辞》天问体式,建构起人神对话的抒情维度;“琼楼玉宇”化用《酉阳杂俎》道教典故,在虚实相生中展开仕隐抉择的戏剧性思辨;下阕“转朱阁,低绮户”运用杜诗移步换景技法,使月光流转成为情感递进的叙事线索;最终“千里共婵娟”突破小我情思,升华为具有宇宙意识的诗性哲思。这种借鉴乐府诗叙事程式的章法布局,使词作获得与《春江花月夜》比肩的时空纵深感。

### (2) 议论笔法的有机融入

《满庭芳·蜗角虚名》就是将议论文植入词的代表。“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17],苏轼在词中直截了当地对名与利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表达出他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这种议论手法的运用,使词不仅是情感的抒发,还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 (3) 典故手法的精准运用

《减字木兰花·得书》借用北朝时前秦苏惠在丈夫被贬后,亲手织成《回文旋图诗》,赠予她的丈夫,以寄托对丈夫思念之情的典故,来表达苏轼与妻子王闰之的深切情意;“求田问舍笑豪英”[17](《南歌子·再用前韵》)这一句运用了“求田问舍”这个典故来比喻辞官归隐;《贺新郎·夏景》中的“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17],这首描写了一个美丽的女子,“扇手一时似玉”,不仅喻指美人肌肤之洁白与品行之高洁,而且暗用班婕妤《团扇诗》的典故象征红颜薄命,隐约抒写东坡怀才不遇的抑郁情怀。

苏轼虽然在手法上对诗多有借鉴,但他的实践始终保持着文体自觉。《水调歌头》严守词律却无斧凿痕,《满庭芳》虽涉议论仍不失词体要眇宜修之美。这种“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革新智慧,恰如钱钟书所言“宋人学唐诗而不似唐诗”[19],在继承与突破之间开创出全新的词学范式。通过诗化叙事与哲理思辨的双重改造,苏轼不仅拓展了词体的表现疆域,更重塑了词文学参与士大夫精神重塑的文化功能。

## (三) 风格的变革

苏轼之前,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词风轻柔细腻、含蓄委婉。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更将“杨柳岸晓风残月”[20]的柔美推向极致。苏轼以如椽巨笔劈开这方精致却略显逼仄的天地,开创了豪放词风,使词的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他的豪放词气势磅礴、意境开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17],开篇便以雄浑壮阔的景象奠定了全词的豪放基调,描绘出赤壁之战的宏大场面,并用这个宏大的场面,描绘了周瑜这位千古风流人物的英雄形象。周瑜的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以及在赤壁之战中的英勇表现,都通过苏轼的笔触跃然纸上。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7]的雄健笔触，将文人词中罕见的报国襟怀注入词体；又如《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17]的铿锵节奏，更将战场杀伐之声谱入词牌这种将历史纵深、地理壮阔与英雄气概熔铸一体的写法，彻底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

他的词也不乏清新自然、旷达超脱的风格，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17]，在面对风雨时表现出的从容淡定、豁达乐观，体现了他独特的人生境界和精神风貌，又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放达”[17]，则将庄禅哲思化作词中云帆，开辟出超然物外的精神空间。

即便是传统婉约题材，他也能以《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中“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17]的幽微笔法，赋予深闺寂寞以诗性深度。总之他对词艺术风格的开拓，为词注入了活力。

### 3.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化根源

#### (一) 重文轻武的政策影响

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朝廷通过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提高文官品秩、设立馆阁制度等系列政策，使文人群体得以深度参与国家治理，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这种制度性安排不仅提升了文人的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重塑了自我——士人开始自觉地将政治理想与文学创作相结合，也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环境，苏轼作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其文学实践深刻体现了士大夫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

如在《策论》中，苏轼明确提出“诗须有为而作”的创作主张，当词体尚被视为“小道”的元祐时期，苏轼已系统地将诗学传统中的“言志”功能植入词的创作。又如王水照在《苏轼研究》[13]这本书中也对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提出的“自成一家”创作理念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苏轼通过融合诗歌的比兴传统与词体的音乐性，实现了对士大夫文化使命的文体实践，体现了对传统文体的创新与突破。这种创新与突破标志着“以诗为词”的创作转向不仅丰富了词的题材，更重要的是构建起士大夫文学与政治实践的新型关系。

#### (二) 诗词同源的文学传统

严格说来，苏轼并不是“以诗为词”第一人。诗词同源的出身，使词从一开始，就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先秦两汉就出现过文体共生的现象，如《郑风·子衿》《陈风·月出》等篇目呈现出的“一唱三叹”结构，就是早期诗歌与乐舞的互生关系，又如屈原《离骚》兼赋、诗、颂文体的多重功能，王逸《楚辞章句》也称其“依托五经以立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更为自觉，刘勰提出文体互渗论，他在《文心雕龙·通变》提出“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强调文体规范与创新并存。其《辨骚》篇指出楚辞“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揭示文体间的承继关系；萧统提出类目交叉法，他在《文选》中将“诗”“赋”“骚”并列。到了北宋词坛，众多词人也进行过尝试，晏殊有过尊体尝试，他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通过“夕阳西下几时回”的哲学追问，将诗的言志功能引入词体，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堂》“章太守，挥毫万字”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词，打破“词媚”的文体窠臼，为苏轼革新提供先例。而王安石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桂枝香·金陵怀古》开创怀古词范式，其“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的宏大视角，将诗的史论传统移入词中。这些都是前人对诗词同源的开拓和继承，而苏轼正式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诗为词”。

他在《与蔡景繁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又指出“颓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苏轼已经将词纳入诗歌谱系，认为词实际上是指像《诗经》《楚辞》、汉魏古乐府等句子长短不一或句式参差不齐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具备抒情言志的功能。

### (三) 士大夫文化人格的觉醒

北宋中叶，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催生出新型的士大夫群体，他们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人格，具有独特的精神风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和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以诗为词”正是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通过词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元祐时期的被贬经历，反促成词的境界升华。《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在自我命运沉浮中提炼出“中秋谁与共孤光”<sup>[17]</sup>的普世追问，使词能够承担起的思想重量比肩诗歌。这种思想力量的增加，正如叶嘉莹所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将词提升到与诗同等的地位<sup>[14]</sup>。（《唐宋词十七讲》），这种提升正源于士大夫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以及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 4. 结论

苏轼的“以诗为词”为后世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打破了传统词体的束缚，使词从“小道”“末技”逐渐走向文学的主流地位。他通过拓展词的题材、丰富词的表现手法和变革词的风格，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和思想内涵，使词能够与诗相媲美，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体裁。苏轼之后，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重视词的创作，词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苏轼的“以诗为词”实践为后世词学理论的发展也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后世词论家在探讨词的创作、风格、审美等问题时，常常以苏轼的词作为研究对象和评判标准。同时他也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山鼻祖，辛弃疾、陈亮、刘克庄等南宋豪放派词人深受苏轼的影响，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苏轼豪放词的风格和创作手法，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怀、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对民族危亡的忧虑，苏轼的影响下，他们将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词成为表达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感的重要文学形式。他的创新精神还促使词论家们不断思考词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推动了词学理论的不完善和发展。清代词论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观点，强调词要反映社会现实，这一观点正是受到苏轼“以诗为词”思想的启发，体现了苏轼对后世词学理论的深远影响。

总之，苏轼的“以诗为词”是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他以卓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对词的题材、手法、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使词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与宋代的文化政策、士人的精神风貌以及诗词同源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苏轼“以诗为词”的贡献，不仅在于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在于拓展了词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境界，使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薛瑞生. 东坡词编年笺证[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2] 唐圭璋, 编. 全宋词·苏轼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邹同庆, 王宗堂, 著. 苏轼词编年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4] (宋)苏轼, 著, 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点校. 苏轼全集校注[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 [5] 龙榆生, 著. 东坡乐府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 [6] 王水照, 朱刚, 著. 苏轼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林语堂, 著. 苏东坡传[M]. 张振玉,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8] 王水照, 崔铭, 著. 苏轼传[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 [9] (日)保苜佳昭, 著. 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0] 刘少雄, 著. 苏轼词八讲[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 [11] 启功, 刘石. 苏轼词新论[J]. 文献, 1993(1): 53-64.

- [12] 饶学刚, 著. 中秋词——东坡超然人生的放歌[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9.
- [13] 王水照, 著. 苏轼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
- [14] 叶嘉莹, 著. 唐宋词十七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5] 赵英超. 新时期以来苏轼诗词研究之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 2014.
- [16] 谢娟燕. 近 40 年苏轼婉约词研究述评[J]. 黑河学院学报, 2021, 12(5): 153-155, 188.
- [17] 叶嘉莹, 朱靖华. 苏轼词新释辑评[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8]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19] 钱钟书, 著.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0] 雷娟, 华鸣凤. 宋词三百首[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5.